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陈红娟

【内容提要】《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被不断翻译，1899—1919年间有17篇文章涉及《宣言》译本，1920—2009年间共出现11个全译本。在这个过程中，《宣言》的翻译经历从日本、苏联、英法等转译到从德文原初文本直译与研究并重的转变。阅读《宣言》的群体也由清末民初士大夫、传教士转变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民众也成为阅读和学习《宣言》的重要群体。《宣言》的不同译本见证了时代变迁下，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追求理想、坚定信念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不断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历史。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作者简介：陈红娟（1983—），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200241）。

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170周年。《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史、阅读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发光”的历史。自1899年《宣言》被译介到中国，中国人就开启了不断翻译、阅读《宣言》的新征程。《宣言》的不断被翻译、阅读见证了中国人认识、接受社会主义的过程，见证了时代变迁下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追求理想、坚定信念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不断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历史。

一、《宣言》汉译本的文本形态：从只言片语译介到全文系统翻译

1899—1919年间真正关涉《宣言》译文的17篇文章中，《宣言》翻译大体经历了从只言片语到纲领提要再到篇章译述的演变。此时，译者对《宣言》的翻译内容、方式都具有选择性，主要是片译、摘译和段译。《宣言》被夹杂在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等社会思潮中进行翻译与传播，不同译者都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宣言》展开阐释。1899年，《万国公报》连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摘译、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节译并编译了《宣言》的主张，但实际上是想表达李提摩太“安民”的主张^①；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宣言》的翻译传播，主要是为了预防资本主义弊病，正如孙中山所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14CKS008）的阶段性成果。

^① 方红、王克非：《〈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外国语文》2011年第6期。李提摩太在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概要》中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策，此处并不是要客观阐释马克思的主张和学说，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纳入“安民”策略，作为他宣扬变革的新学说的一部分。

“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①，试图借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论证三民主义之合理性，“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政”在中国“用不着”^②；1908年，《天义报》摘译了《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虽然在最后的跋中谈及《宣言》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入门书，但其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强调阶级斗争来宣传无政府主义。可见，翻译者自身的主张及其对革命本身的理解，决定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内容的选择和意义建构方向，这都不同程度地将译者自有的思想纳入经典著作的阐释，经典著作译文本身也反映了译者的思想诉求。因此，在1920年以前，译者大都不关心《宣言》自身的内在逻辑，相反，还对《宣言》的思想成分进行了各种拆解和组合。可以说，此时中国人所理解的《宣言》基本上是碎片化的，且为“他者”即改良主义、激进革命、无政府主义等目的而服务。不同立场的译者译介了《宣言》，同时也赋予了《宣言》诸多原本不属于《宣言》的东西，《宣言》本身蕴含的真理性一时被遮蔽。

从1920年陈望道《宣言》汉译本到1945年陈瘦石译本，《宣言》汉译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了由五个译本构成的系列文本群（见表1）。《宣言》翻译经历了从选择性译介到有组织的系统翻译的转变，《宣言》不再是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等社会思潮的附属品，而是体现阶级性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

表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产党宣言》汉译本分布

出版时间	1920	1930	1938	1943	1945
译者	陈望道	华岗	成仿吾 徐冰	博古	陈瘦石
依据	日文	英文	德文	俄文	英文
出版社	社会主义研究出版社	华兴书局	延安解放社	延安解放社	商务印书馆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纷纷涌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阶级斗争、武装推翻政权的革命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日渐凸显。马克思主义成为独立的社会思潮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译者和读者从阶级、革命等视角审视和解读《宣言》成为可能。

此外，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中国共产党不仅成立人民出版社，而且建立马列学院编译部、翻译校对委员会等专门从事翻译、出版、发行马列主义著作的机构，促使《宣言》的翻译出版发行流程化。这就改变了过去“各自为战”、个人凭兴趣或受委托进行翻译的状态，改善了翻译条件，促使马列著作翻译向组织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宣言》翻译和传播彻底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由“单兵作战”到“集体智慧”“规范操作”的转变。1920—1949年这期间产生的五个译本，除了陈望道译本和陈瘦石译本不是中共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外，其他三个均受党组织委托。华岗是在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的情况下翻译了1888年恩格斯校阅的《宣言》英文版；成仿吾、徐冰则是在宣传部寻得《宣言》德文版的情况下接受委托，完成翻译工作的；博古是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接受委派，承担根据俄文版对成仿吾、徐冰《宣言》译本进行校译的任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2页。

务。当然，译者在翻译《宣言》时受当时社会环境与思维定式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凸显《宣言》中革命紧迫性与斗争必要性的价值诉求，毕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总是和特定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俄文编译局、中央编译局等专门机构，这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由规范化、组织化向专业化、制度化迈进。从1949年莫斯科的百周年纪念本到2009年中央编译局的最新版本，《宣言》汉译本在1949年以后形成由六个译本构成的文本群（见表2）。

表2 1949年以后《共产党宣言》汉译本分布

出版时间	1949 ^②	1964	1978	1978	1995	2009
译者	谢唯真	中央编译局	成仿吾	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
依据	德文	德文	德文	德文	德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
出版社	解放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1949—1978年间，《宣言》翻译受到俄文本影响较大，译本中带有苏联话语的痕迹，难以完全彰显《宣言》的学术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MEGA²历史考证版取代俄文版成为国际主流版本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价值得以彰显。21世纪以来，学界呼吁“回到马克思”，摆脱传统解读框架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教条式解读的需求渐涨，在原初语境中翻译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要求愈加迫切。在这个时期，《宣言》的译本不仅更加准确，而且对文本的解读更加客观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单行本《宣言》中增加了附录，包括《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论述摘编》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与《宣言》放在一起，从文本更递与创新的角度展现《宣言》文本创作过程。而《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还原了《宣言》创作的历史语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论述摘编》则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经典作家对《宣言》的评价与认识。这样，《宣言》就不再是刻板、平面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而是鲜活、立体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了。这种从“过程逻辑”而非“成果逻辑”展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重点凸显了在特定历史境遇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创作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宣言》进入中国语境从19世纪末被只言片语地译介到当前动态、立体地展现文本生成过程，

① 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²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2页。

② 对谢唯真译本即莫斯科百周年译本的出版时间学界颇有争议，此处采用王保贤在《〈共产党宣言〉“莫斯科百年版”译本的几个问题》（《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3日）一文中的提法，即1949年11月以后其在中国出版。因此，本文将其放到1949年以后进行分析。

使中国人对《宣言》的认识逐渐祛除了外来语境、社会思潮在文本上所附加的“意义”，从而能够客观全面地领会文本的“原初意义”。

二、《宣言》汉译本的翻译方式：从转译到翻译研究并重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不断激荡的时代背景下，1899—1919年间，知识精英对《宣言》的认知还比较肤浅，采用的翻译方式主要是“转译”。受历史条件所限，他们对《宣言》的翻译与阐释出现了不少失误、误读甚至曲解。

1899—1919年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处于学习和翻译阶段，这个阶段《宣言》的译介更侧重于“使用”，即有用性。而且，译介大多是“转译”和“介绍”，受制于日本、英法、苏联等源语境的影响，解读在内容上侧重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而无论是从日本、苏联还是西欧进入中国，《宣言》都沉淀着他国文化、政治诉求以及译者在文本中的主观理解和表达。在《宣言》译介初期，先进知识分子尚未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难以剥离“他者”而非文本的“意义转嫁”。这样，《宣言》解读初期，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将其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硬性嫁接，产生不少误读。

马君武将社会主义置于社会进化论中，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指出“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但认为“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故社会主义者，不惟不与达尔文主义相对立，且益广其界而补其偏，虽谓达氏主义得社会主义而其义乃完，可也”^①。1919年，“十条纲领”被谭平山、舍我、张闻天等反复地提及和转译，但他们并不完全理解。比如，作为青年学生的张闻天，把社会问题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人类少，物质多；第二个时期，人类渐渐多起来，物质也渐渐不够用了，需要借助于武力迫使劳动；第三个时期，人类愈繁庶，物质越发不足；第四个时期，人口越见增加，物产的生产方法虽比以前进步，然终不及人类增加的快，所以物质越发不够用了^②。这个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理论较为相似，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种将社会制度带来的贫富分化归结为自然原因的理论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相符。

1920—1949年间，译者对《宣言》的理解与认识水平有所提升，翻译方式多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得以解读和阐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论战与思潮的碰撞中，中国共产党厘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伪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开启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认识和理解《宣言》的新路向。20世纪初，竞相传入中国的社会思潮，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③。这些“主义”常未经仔细审视就从西方引入中国，不少人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混淆，导致1920年前对《宣言》的解读呈现多元化。然而，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围绕“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三次大论战，早期的共产党人肯定了中国要走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张通过阶级斗争而非阶级调和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①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1903年2月。

② 参见《张闻天文集1919—1935》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③ 近五年涉及相关思潮的书主要有：黄克武：《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陈金龙等：《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1—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等等。

此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玄学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论战，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比如论战中深化对唯物观的认识，“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①；肯定阶级斗争的必要性^②等等。至此，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确，《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亦结束了被其他“主义”歪曲、误解或“贴标签”的阶段。

其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阐释性作品陆续被翻译，译作与《宣言》交相呼应，相互支撑与论证，使人们对《宣言》的理解更加全面、科学。1920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比较少，《宣言》的文本理解难以借助马克思主义其他文本实现“互文”。1920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文本不断涌现。仅1920年就产生四种对中国现实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汉译本，即《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更重要的是，一些阐释经典著作的作品逐渐被翻译，1920年还出版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等七本著作^③。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被介绍与传播，而是开启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研究并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1924）、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1924）、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等著作相继出版，加深了中国人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认识，对《宣言》的理解更加科学化。

其三，《宣言》文本创作的过程被展现，增强了对《宣言》理解的准确性。从《宣言》创作史角度看，《宣言》正式文本产生前，恩格斯曾拟定过两个“草稿”，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与《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发现以及受到重视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出三卷的说明中特别强调了该文本的价值：“值得指出的是，本卷收入了一九六八年首次在西德汉堡发现的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极为重要的文献。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最早文本，反映了《共产党宣言》形成过程的最初阶段。”^④而《共产主义原理》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翻译。华岗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不仅有《宣言》而且还有《共产主义原理》，当时书中译为《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宣言初稿》，这为该阶段科学理解《宣言》奠定了基础。

此外，就译本本身而言，无论是译本的序言还是附注^⑤，都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从陈望道译本没有序言到华岗译本的3个序言、到博古译本的4个序言、再到谢唯真译本的7个序言，译本呈现出逐渐完善的过程。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除了对“有产者”“无产者”进行解释外，并没有更多的解释；成仿吾、徐冰译本除了还原恩格斯对英文本原有的注释外，还增加了编辑部注、译者补注等；而到博古译本，编者自身增加的编者注则高达17个，总附注高达29个之多。从陈望道译本的2个文中附注到博古译本的29个附注能够看出，《宣言》的翻译逐渐实现了从单纯翻译传播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转变（见图1）。

① 《陈独秀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83页。

②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6页。

③ 参见胡为雄：《192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出三卷》，《人民日报》1980年3月18日。

⑤ 文章中所有的附注主要指《宣言》汉译本文中注释和页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宣言》汉译本只有文中注释和页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宣言》汉译本既有页下注（也就是附注），也有文后注（也就是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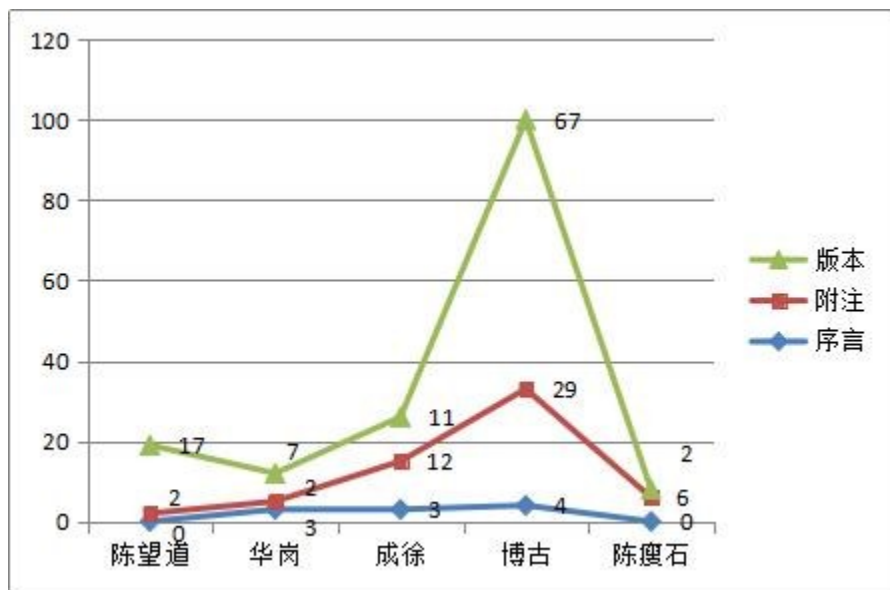


图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产党宣言》译本序言、附注、版本变化趋势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宣言》的翻译、出版由以往的“多样分散”的“自由行为”上升为“统一集中”的“国家行为”。翻译行为规范化和组织化后，翻译工作集中了全国专家学者力量，技术层面更加科学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翻译初步显露出从“翻译”转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趋势，这之后中央编译局则明确提出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①。此时，《宣言》的翻译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在科学化层面，专家学者对原初术语与对等词、直译与意译、经过时空挤压后文本存在的意义流失等方面有着深刻认知。在翻译中，他们对翻译的质量和水准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要注重翻译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符合中国读者的需要和习惯”^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言》翻译更加注重通过附注来阐释其内容，不同译本中有39至48处附注，1964年后的译本更是有33至45个注释对专有名词、历史事件、社会背景、人物活动等进行说明（见表3）。同时，《宣言》译本尊重原初的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多元表达，也承袭了以往在同一语词加注释时参照多个原始文本的习惯。例如“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③中“公社”一词的附注中就增添了恩格斯在英文版和德文版不同的解释，即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以及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即“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④。

① 参见俞可平主编：《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② 俞可平主编：《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脚注②。

表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宣言》译本的附注、注释统计表

1949. 11	1964	1978	1978	1995	2009
谢唯真	中央编译局	成仿吾	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
45个附注	48个附注 33个注释	44个附注 38个注释	40个附注 44个注释	39个附注 43个注释	48个附注 45个注释
42处编者注 3处译者注	34处编者注 10处恩格斯所 加附注 4处其他附注	32处译者注 12处恩格斯注	27处编者注 13处恩格斯注	36处编者注 (其中274页附 注3有两个编者 注) 3处其他附注。	45处编者注 3处其他附注

注：同一词附有不同版本（英文、德文等）的恩格斯注，本文统一计算为一次附注。

从进入中国语境初期的转译文到1920年没有序言、没有注释的全译本，再到2009年7个序言、附加48个附注、45个注释的全译本，《宣言》的文本形态越来越丰富。不同的《宣言》译本见证了中国人对《宣言》解读不断深化的过程。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解读多是从其他主义和思想中来管窥《宣言》，《宣言》难免被曲解。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入，其对《宣言》的认识与解读更加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宣言》文本语言更加“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宣言》的重新翻译、传播与阅读还担负起塑造民众思想价值理念的重任，科学、准确、可读性等成为衡量译本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

三、《宣言》汉译本阅读群体：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

《宣言》经历片译、段译、摘译到全文翻译，其传播对象实现了从最初的知识精英到中共党员干部再到普通民众的扩展。

1899—1919年间西方理论的引介与传播大体经历了以士大夫、传教士、知识精英为传播主体的变迁。以往先进的理论书籍主要以文言文为主，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读者很难读懂。一些杂志如《新青年》《国民》等多以长篇大论的文言文为主，只适合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阅读。文言文常常大量引经据典，而这些典据的理解往往需要一定的知识积淀，导致文本传播大大受限。不过，当中国社会为迎合西学强国需要，用易学易懂的汉语来学习和阐释科学知识，培养新时代的“国民”之后，不少杂志期刊改变以往用典雅的文言文来撰写文章的方式，转向了白话文。“五四”运动以后，短篇白话文的论述日渐增多，受众群体日渐扩大；发行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且期刊发行出版风格也转向平民百姓。期刊形式上，在发行周期短、传播速度快方面以周刊、旬刊为主；在传播力度大、刊数多方面，以报纸为主，如《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①。这样，不少关乎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评论就能较快传播到普通民众中去。《宣言》的片译文就刊登在《每周评论》上，《湘江评论》也出现对《宣言》的间接性转译，《宣言》的文风自然实现了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不过，就《宣言》传播范围来看，《宣言》的传播与使用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其传播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并没有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

^① 参见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34—135页。

1920—1949年间,《宣言》传播日渐广泛,阅读和传播的主体由社会知识精英拓展至中共党员干部,传播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地区,如瑞金、延安等。主要原因是:其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组织重视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大大推动了《宣言》的传播。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中央设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机构,如中央出版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译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译委员会等。而且,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马列学说在工人、农民等不同群体间的传播。对于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党组织就特别注重根据青年人的特点、需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马列著作的宣传,该刊刊登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中就曾对陈望道的《宣言》译本进行过简介^①。

其二,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的确立与规范大大提升了《宣言》在党内的阅读率。随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学习制度的完善,共产党的干部成为阅读《宣言》的主要群体。1944年3月5日,中央指定阅读《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五本理论书”,以配合整风运动。从博古译本的文本形态来说,此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阅读群体主要还是集中在干部层面,不少译本上印有“党内高级干部学习的课本”“干部读本”“干部学习丛书”“干部高级读物”“中级党校教材”等。

其三,白话文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大大扩展了《宣言》在中国传播的范围。陈望道译本与民鸣译文的文言文相比,已经彰显出白话文、口语化的特点,华岗译本、成徐译本、博古译本在语言风格和表达方面则更加通俗化(见表4),语言的通俗化无疑大大扩展了《宣言》的传播范围。此外,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杂志宣传也进一步扩大了《宣言》的影响,例如曾在苏区发行的《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上刊登《宣言》的征订广告^②。

表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宣言》译本首句译文与民鸣译本的比较

民鸣译文	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昔欧洲之有权利者,欲施禁止之策,乃加入神圣同盟。若罗马法皇、若俄皇、若梅特涅(奥相) Metternich、若额佐 Guizot、若法国急进党、若德国侦探。
陈望道译本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Guizot)法国急进党,德国的侦探,都在这里。
华岗译本	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的列强为要驱除这怪物,乃结成一个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Guizot),法国急进党,德国政治警探,都加入在这里面。
成徐译本	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巨影。为了根绝它,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神圣同盟,教皇与沙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国的急进派与德国的警探们。
博古译本	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为着神圣地驱除这个幽灵:教皇与沙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国的急进派与德国的警探们。
陈瘦石译本	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旧欧洲的全部实力为要驱除这个精灵,已经结成一个神圣同盟: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Guizot),法国的急进党和德国的秘密警察。

① 参见冰冰:《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中国青年(上海1923)》1924年第1卷第24期。

② 参见王海军:《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出版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4期。

而且,从《宣言》的版本和传播地来看,不同《宣言》译本的版本由2个到67个不等,总体上呈现版本日渐增多的趋势(见图1)。尤其是新华书店成立后,党中央曾根据解放社样本大量重印《宣言》,发行多个《宣言》版本,促进其传播。“《共产党宣言》就有东北新华、华北新华、太岳新华、胶东新华、晋察冀新华书店、冀鲁豫新华书店、中原新华、皖北新华、太行新华和华东新华等版本。在东北新华的版本中,又有大连—东北新华或长春—东北新华等不同版本。”^①另外,从出版地来看,《宣言》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从开始的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断向冀鲁豫、华东、华中拓展(见表5)。陈瘦石译本虽然比较简单没有序言、没有附注,只有两个版本,但它打破了国民党在国统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红色书籍的封锁,使《宣言》得以在国统区传播。

表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宣言》译本出版地统计表

《宣言》译本	出版地
陈望道译本	延安、武汉、上海和广州
华岗译本	上海、武汉、瑞金
成徐译本	延安、山西、冀鲁豫、江苏淮安、上海、武汉、香港
博古译本	西北、延安、华北、东北、天津、大连、冀鲁豫、华东、华中、上海
陈瘦石译本	国统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该阶段《宣言》的阅读主体虽然是中共党员,但不少社会精英亦对《宣言》有所关注。五四运动前后“讨论马克斯的学说或他种社会主义差不多已经变为一种时髦的标志”^②,《宣言》在有影响的书局、进步的报刊、社团以及非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知识精英间时有传播。比如,1922年天津的革命青年就曾组织过“马氏学会”,“马氏通信图书馆”专门借阅中文、日文、英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其中陈望道的《宣言》译本就在书单中^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曾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宣言》是学习的重要文本之一。《宣言》的传播范围拓展至全国各地,阅读对象由高级干部、党员扩展至普通民众。

《宣言》成为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重要文本,“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底共出版三十三种。其中由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的,共三十种,合计三百十三万七千册。这些书籍中印数最多的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④。党政干部依然是学习《宣言》的主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全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决定》《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指示》等对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时间、学习制度、学习章程和制度进行了具体安排。文件还要求“高级干部在职自修五门课程原则上一年学完一门”^⑤。在不同的时期,凡涉及党政干部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书籍中,《宣言》基本上是必读书目。1963年,为高级干部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目录“三十本书”,马恩经典著作共十一本,其中第一本即为《宣言》;1964年,高级干部学习三十二本大字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宣言》在内的马恩经典著作共五

① 赖钦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222页。

② [德]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李季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序言。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5页。

④ 《纪念伟大马克思的诞辰 各大城市热烈进行讲演、展览、出版等活动》,《人民日报》1953年5月5日。

⑤ 《干部教育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第771页。

本；1970年，党内外干部和群众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含《宣言》《法兰西内战》等六本马恩经典著作。此外，1971年全国范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过程中，《宣言》和毛泽东的论著放在一起成为重点阅读和学习书目。

当然，此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和阅读的对象不再只限于党政干部而是扩展至青年团员、工厂、机关和学校中的党外积极分子、学界知识分子等。对于普通工人而言，每个单位还专门配有学习辅导员，针对文化水平低的老工人通过“逐字逐句念”“一句一句解读”的方式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马列经典燃起全国人民的热情，《宣言》的阅读也扩展至各个行业，甚至连农村妇女、锻压机床厂工人、普通的邮递员都阅读过。

学校是系统传播与学习《宣言》的重要阵地，普通知识分子亦是阅读和学习《宣言》的群体之一。其一，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和《宣言》研究课。1957年11月，中宣部在党校和知识分子中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中还制定了课程的阅读目录，其中包含《宣言》中《资产者和无产者》第一章的内容。在一些重点学校还专门开设了《宣言》的研究课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京大学在进行课程改革时增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及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的课程”^①。其二，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参考读物专门解读《宣言》。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配合“全国各地广大的机关干部，工矿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介绍”的参考读物，其中就有熊复等专家关于《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二十五篇经典著作的专论^②。此外，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潮，各级学校、机关、工厂都开展了相关的活动^③，而且不少地方也出现多个学习小组，对《宣言》进行集中学习并开展交流学习体会的活动。

总之，1899—1919年间，《宣言》的阅读对象主要是知识精英，文言文的写作文体决定了普通民众难以真正接触、读懂和理解《宣言》。1920—1949年间，《宣言》是中共党员提高自身马克思主义素养的重要读物，其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宣言》真正开启了大众化的历程，普通民众成为《宣言》的重要阅读群体。《宣言》在民众的阅读中发挥着形塑信仰，坚定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心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本书目、版本、简介（1950—188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 [3] 王东、陈有进、贾向云：《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 [4] 《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5] 《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编辑：张 剑）

① 陈泓：《北京各大学的课程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7日。

② 参见竺才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介绍”》，《人民日报》1958年6月4日。

③ 参见《艾思奇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页。